

青稞与野葱

徐鲁

青稞是一种耐寒性强、生长期较短的高原谷物，也是生活在青藏高原地区的藏族同胞的主要粮食作物。青稞分春青稞和冬青稞，成熟的青稞收获后，就像麦粒一样，通常会被磨成粉状，就是青稞面。把青稞面炒熟，用牛奶、羊奶或清水等拌和成糌粑，是藏族同胞的日常主食。糌粑富含热量，能充饥、御寒，且方便携带，非常适合牧民的生活。

红军长征经过川西北高原地区时，要在极寒的气候条件下爬雪山、过草地，一块糌粑，一把青稞炒面，就成了红军战士们充饥和获取热量的主要食物。无论是红一方面军，还是红四方面军，在准备翻雪山、过草地之前，各部队筹集和配给的主要食物，都是青稞麦。

但由于高原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青稞产量并不高，所以对于红军战士来说，每一把青稞都是宝贵的。进入大草地前，红一方面军筹集到几千斤青稞麦和一些盐巴。指挥部还决定，每头牲口要驮上30公斤粮，一般战士要背上十几公斤青稞，每个“红小鬼”也要背上七八公斤粮食。可见，青稞是部队六天六夜过草地期间最宝贵的“救命粮”。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的红军长征纪念馆里，陈列着一块珍贵的木板。这是当年红军给村里的藏族兄弟留下的一张“割麦证”，木板上清楚地写着：“我们割了200斤青稞，这块木牌可作为购买青稞的凭证，你们回家后凭着这块木牌，可找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兑取买青稞的银圆。

原来，1935年7月，红军到达松潘县毛儿盖镇克藏村时，当地藏族群众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土司的恶意恐吓，不敢接触红军，不少村民都躲藏到了山里或别处。红军购买和筹集粮草十分困难。红军一时无法找到青稞地的主人，只好自己动手，收割了一部分青稞。然后找来一块木板，清清楚楚地写下凭据，留下郑重的承诺。

红军离开后，藏族兄弟回到村里，看到了这块“割麦证”，就妥善保存了下来。没想到，这块木板成了红军队伍在极端艰苦环境中坚守群众纪律、决不自拿老百姓一粒青稞的宝贵见证。

在当时，红军队伍向老百姓“借粮”，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十几岁就跟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并且在征途中断断续续写下一册珍贵《长征日记》的萧锋将军(原名萧思涓)，在1935年9月12日(农历八月十五)的日记里，记录了部队在北上途中，攻破腊子口前，经过藏区阿夏乡时，向当地百姓借粮的细节：“这一带青稞

麦长得较好，筹粮比较方便些。”“我们借粮后，都留下条子……这种借粮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一边吃，一边心里难过。”

1933年至1935年，红四方面军转战在四川阆中一带时，先后有两万多名阆中儿女参加了红军。1935年春天，红军强渡嘉陵江时，20岁的李本云担任侦察排的排长。李本云晚年回忆起自己随部队过草地的时候，有两件事令他刻骨铭心。一是在风雪茫茫的草地上，每人身上带的那点宝贵的青稞粉吃光了，饥寒交迫之中，大家只好寻找草根、野菜，甚至把皮带割成小块，煮一煮充饥。据说，有一位战士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把马粪放在水中淘洗一番，找出其中没有消化掉的几颗青稞粒充饥。另一件事是，一位名叫董盘志的战友，在草地上艰难行进时说过一句话，让李本云终生难忘：“我要用双脚，踩出通向胜利的道路。”其实，这时候，董盘志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就在他强撑着身体坚持前行，并且说出那句话后不久，这位年轻的战友不幸栽倒在一处沼泽边，再也没有站起来。李本云和战友们噙着泪水，找来几把枯草，简单掩埋了战友的遗体，咬紧牙关，互相搀扶着，继续向前。

阿木初是1935年在川北加入红四方面军、后来一度失散的一位藏族女红军。她清晰地记得自己当年和家乡的几个女孩子参加红军的情景：一天，一支红军队伍经过松潘地区时，看到一个女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正在山上放牛。两个红军姐姐走上前来，亲切地问她年龄多大了？阿木初回答说：“12岁。”

“小妹妹，想不想跟着我们红军走呀？你看，有这么多人参加了红军，都是干革命的。”这时候，阿木初对红军和革命还是懵懂的，但有一点她看在眼里：这些红军姐姐待人和蔼可亲，还把随身带的青稞糌粑分给她吃，而且还有那么多年龄跟她相仿的穷人家的女孩子和男孩子，都参加了红军，他们的脸上露着开心的笑容，没有丝毫恐惧和愁苦的样子。因此，阿木初认定，跟着红军是不会受欺负的，红军也不会干欺负人的坏事。于是，12岁的阿木初也加入了红军队伍，跟着红军开始了长征。

从松潘到小金，一路上，阿木初这些“红小鬼”都得到了部队悉心的照顾。让阿木初终生难忘的一件事，也与青稞有关。从雪山到草地的一路上，没有食物，红军官兵就靠煮树根、野菜充饥，偶尔弄到了一点青稞粉，也总是让她们这些“红小鬼”优先。



贾德福也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女战士，参加红军前才28岁，还没有来得及生育，就不幸守寡了。在当时，一个小寡妇，婆家、娘家都不怎么待见，加上封建旧观念的沉重束缚，要想挣脱这些枷锁可不容易。所幸的是，红军女兵们不断开导她，鼓励她、帮助她，终于使她鼓起勇气，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的一名战士。

长征途中，贾德福担任妇女工兵营的炊事班长，身上总是背着一个大背架，背架上面绑着一口大铁锅，外加一把锅铲，再加上其他一些炊事用具，重量远远超过四五十斤。有一次，她背着铁锅和炊具赶路时，又遇上了“鸡下蛋”(指国民党的飞机扔炸弹)，那一瞬间，她想到的不是赶紧就地趴下，用铁锅挡一下自己，而是赶紧把铁锅卸下，用身体趴在铁锅上去保护铁锅。

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前，妇女工兵营的每个女战士只领到了少量的青稞作为干粮。显然，仅仅依靠这点青稞，肯定支撑不了走出草地的日子。为了尽量补充一下大家的伙食，作为炊事班长的贾德福，想尽各种办法，几乎一夜愁白了头！

进入草地后，战友们发现，贾德福身上的干粮袋和大家的并不一样，其他女红军的干粮袋里只装着几把青稞面，她却在干粮袋上又缝出了好几个小袋子，看上去像个“百衲袋”，除了青稞面，袋子里还分别装着盐、姜、蒜、辣椒粉等。这些除了用于给大家“改善生活”，还要特别优先给伤病员和“红小鬼”。

路上只要遇到有野葱花、绿草和其他野菜的地方，贾德福首先想到的就是赶紧组织炊事员们分头去采摘花椒叶、杏叶、野菜、灰灰菜等，凡是能人口吃、吃了不会中毒的野菜，都摘来煮上一大锅，然后放上一小撮盐，给战友们当菜吃。很多战友好久都没闻到青菜味了，这时候，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带一点清新野菜气息的野葱汤、灰灰菜汤，哪怕寡淡得没有多少咸味儿，也是十分开心的。

红四方面军准备第二次过草地时，战士们的口粮就更稀少。有的战士千方百计地弄到了一点青稞麦，却找不到石臼把它压碎。要知道，整粒青稞麦吃到肚子里是很难消化的，肠胃功能弱的女同志，吃了没有磨成面的青稞麦，还会拉肚子。有一天，部队到达水磨沟时，贾德福意外找到了一副小小的水磨。她如获至宝一般喊来炊事班的战友，连夜把全营的青稞麦都磨成了面。

过草地时，大家的青稞面都吃光了，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个饿得有力无力的，贾德福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她和几位党员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青稞面分给了生病的战友和“红小鬼”，自己挖草根、挖野菜充饥。

老红军成仿吾的回忆文章《在千里雪山中》，写到了爬过雪山后，青稞已是所剩无几，他们主要靠吃豌豆尖、野菜等过日子。各单位每天轮流派一些人去找野菜。炊事班在一大锅野菜里，按每人每天二三两青稞麦的比例，抓几把青稞麦子放进去，有时打一桶“饭”回来，尽是野菜，若想弄到几粒青稞麦，很不容易。

1935年8月2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率先进入松潘草地不久，饥饿开始直接威胁红军官兵的生命。青稞越来越稀少，野菜、草根就成了红军的主要食物。后来，朱德发出了一个“尝百草”的号召，临时成立“野菜委员会”，鼓励大家四处寻找能用来果腹充饥的野菜。朱德亲自指导“野菜委员会”编写了《吃野菜须知》，下发到各连队，同时还组织成立了“野菜调查小组”和四十余人的采摘队，特意在营地举办野菜识别展览，给野葱、野韭菜、荠菜、车前草、马齿苋、灰灰菜等数十种野菜——标注上味道、功效和食用方法等。有小战士认得某种野菜，说：“在我们老家，这是药材，可做草药。”朱德笑着回答：“是啊是啊，既然能当药材，也就能做食材嘛，现在我们应当叫它‘革命菜’喽！”

野葱，是一种石蒜科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也叫麦葱或山葱，主要生长在四川、青海、甘肃、陕西等地海拔2000米至4000多米的地区。野葱的茎叶呈细圆管状，味道清香。野葱花有白、黄、紫等颜色。野葱的茎、叶和花都可作为食物。野葱花凋谢后，地下鳞茎逐渐膨大，有发汗、散寒、消肿和健胃的功效。

在青稞短缺、食不果腹的日子里，生长在风雪中的野葱和美丽的野葱花，不仅成了给战士们充饥的口粮，给他们增添了前进的力量，也给红军官兵们带来了春天的讯息和胜利的希望。正如诗人芦芒(电影《铁道游击队》主题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词作者)在《野葱花》一诗里所赞美的那样：“野葱花，野葱花！你像星星闪耀在碧绿的茎叶上；吐出川西北大草地的气息，映着夹金山冰雪的光芒……你星星点点长在草原上，你朴素的形象、鲜艳的色泽，就像红军的脚印在闪光！”

坐落在天津市西青区王兰庄村的天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原为天津学生抗日救亡委员会教育点陈列馆)是全国唯一以一二·九运动为主题的专题纪念馆，其馆藏丰富，翔实地记录了一段峥嵘岁月，1985年，在贺龙元帅夫人薛明等人的倡议下此地竖立了义教点旧址纪念碑，1987年陈列馆建成，历经改陈更新，一直吸引着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

或许人们会问，为什么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重大历史事件纪念馆会设立在一个村庄里呢？1936年暑假，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天津市委以及天津学联的领导下，从北洋工学院和三八女中前来的青年学生在王兰庄村进行“义教”教授农民识字，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传播革命思想。这是二·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学生教唱的歌曲有很多，那个时代的主题就是抗日救亡，所以那些歌曲的主题都围绕于此，它们凝聚形成一股强音，在天津近郊的土地上响起。随着一二·九运动应运而生的《救亡进行曲》，也在王兰庄传播开来，这首歌曲这样唱道：“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作为一二·九运动的直接产物和精神战歌，它鼓舞斗志，也宣传全民抗战的主张，它提到的“工农兵学商”，是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代表。

那时，中国工农红军已然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他们在长征途中逐步北上，过雪山草地，一步一步走向陕北，也正是在同一时期，已侵占东北的日寇又向华北步步紧逼，华北危机四伏，国家也在风雨飘摇之中。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它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在巴黎《救国报》上全文刊登。这份宣言提出了一个口号，那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它还引用了《诗经》里的一句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意思是兄弟可以在家里内斗，但当外敌人侵的时候，要一致对外抵御。它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军队、阶级、职业，凡愿意抗日者，都联合起来，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份影响深远的宣言，一经传播迅即引起强烈反响，平津两地的进步学生从多种渠道知悉其内容，并由地下党组织传达学习。这年的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初，在甘泉象鼻湾完成与陕北红军的会师。当11月《八一宣言》精神从苏联共产国际传到陕北之时，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毛泽东、朱德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明确响应《八一宣言》内容精神，全面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建立。这时，华北局势依然险峻，国民党当局准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迎合日本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闻之遂起草《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其中有这样一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随即爆发，北平学联向新华门请愿，各大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散发传单，高呼口号。一二·九运动的波涛迅速涌向天津，当年12月18日，在天津展开了“一二·一八”游行，在南开校园，在海河之畔，津门学子群情激昂，民族情绪高涨。

就在天津学生游行的同一时期，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下河滩田家窑窑洞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升为党的总路线。华北与西北的局势息息相关，红军抵达陕北会师的胜利消息是对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有力鼓舞，而一二·九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形成。所以，在四年之后的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二〇一九四周年的会上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的讲话中指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都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确实，这两件事有着相互作用，所以从这一点说，长征虽然未途经平津，虽然有着千钧之重，然而却关系莫大。

就在瓦窑堡会议结束两天后，当年的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明确总结长征，有一段精准而精彩的话流传甚久，可谓脍炙人口，他这样说道：“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一路播下的种子，它的广度不只是在红军队伍走过的十几个省，而是在全国；它的深度也不只在当时，而是影响深远，直到现在。二二〇九运动中的暑期“义教”活动，也正是播种的一次过程。当时的青年学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一曲曲高歌，热烈而坚定地抒发着爱国的情怀，1934年12月随电影《桃李劫》上映而发行的《毕业歌》，直抒胸臆地唱出“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句子，青年学子虽未远行，但理想和精神已踏上征程。这首歌唱这样铿锵有力地唱道：“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高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1936年9月，王兰庄建立了天津西南最早的党支部，直接受中共天津市委领导，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在这里参加“义教”的青年学生，在接受淬炼之后，纷纷奔赴延安或者晋察冀边区……一颗颗种子播撒到四面八方。

题为1936年夏，爱国学生在津郊开展义务教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第五四九八期

津派文化大家谈

王玉哲(1913—2005)，字维商，河北深县人。初中在河北省立第十中学读书，高中就读于北京市立第四中学，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时，抗战爆发，他随学校辗转抵达长沙、云南，在西南联大继续学习。1940年毕业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读研究生，三年后毕业获硕士学位。其后，先后任教于华中大学、湖南大学，1948年应南开大学之聘，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史史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还先后创立了先秦史研究室、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在南开大学工作的57年里，王先生为南开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有王先生在，南开大学被誉为先秦史研究的一座重镇。

作为我国著名的先秦史学家，王先生在古文献、古文字、古音韵等多方面功底深厚，治学严谨，讲究实证，多有创新。有《中国上古史纲》《中华远古史》《古史集林》等著作传世，在历史学界有着极大的影响。

甲骨文与天津(九) 王玉哲教授的 甲骨文研究

朱彦民



因为先秦史研究的需要，王先生长期致力于甲骨学研究。西南联大研究生时代就曾选修唐兰《甲骨卜辞研究》课程，深入学习甲骨学。在唐先生的指导下，撰写了《宋代著录金文编》稿本上下册，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字学研究基础。后来他在南开大学讲授《甲骨史料选读》等课。他培养的许多学生也都在甲骨文和甲骨学研究方面作出了成绩。

王先生本人虽然没有专门的甲骨学著作，但他在先秦史研究中，尤其是在对商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中，非常注重利用甲骨文字材料，对甲骨文反映的殷商时代社会历史进行了全面综合的探索。在甲骨文考证、甲骨卜辞释读、文献补正、甲骨分期分类、周原甲骨族属、商族起源和商代社会性质等诸多历史问题上，也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形成了一家之言。

王先生较早地注意到中国上古史中的民族问题，研究生毕业论文就写了《蛮貊考》，其后又有《鬼方考》《鬼方考补正》《卜辞邦方即蛮貊说》等论文，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材料对这些早期民族问题进行论证，对包括王国维在内的权威专家观点进行重新解读，形成新论，颇受学术界重视。其中《鬼方考》还荣获当时教育部学术发明奖。

王先生更多的是利用甲骨文字材料，对商代社会制度与社会性质进行复原研究。其《试论商代“兄弟弟及”的继统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就是充分利用甲骨文字材料，由商代“兄弟弟及”继统法及其演变，论及殷商社会性质的变迁，认为商在盘庚之前为父系氏族社会，实行“兄弟弟及”制度；至盘庚迁殷之后进入奴隶制社会，王位继承法也开始从“兄弟弟及”逐渐过渡到反映私有制的“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

在上世纪那场著名的社会史分期讨论中，王先生积极投身

其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西周封建说；商代前期还未正式进入奴隶社会，而是正处在氏族社会和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商代晚期已是奴隶制社会时代；到西周时期已经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已经进入到了初期的封建社会了。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这一研究，王先生主要是从甲骨文中出现的奴隶、人殉、人牲和俘虏以及“众”与“众人”等社会群体的身份地位分析入手的。

作为历史学家的王先生，较少对甲骨文单个字的考证，其对甲骨文字的考证往往不是为了考字而考字，而是通过对一些关键词语的考释而解决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比如其学术名篇《甲骨、金文中的“朝”与“明”字及其相关问题》和《箕子之明夷》与《朝鲜》等，就是这样典型的例子，对学术界误释为“春”的甲骨文“朝”字进行重新解读与正名，并与商末周初“箕子去朝鲜”的历史大事结合起来。

虽然王先生没有专门的甲骨学著作，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甲骨学本身和对甲骨文字的研究与贡献。王先生在古史研究过程中，往往对涉及的甲骨文和甲骨学有关问题进行随机性的探讨，所以他的甲骨学研究成果往往编缀于其史学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间。比如他对甲骨文的发现这一问题，他不同意只是说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而是将王懿荣、孟广慧、王襄都看作甲骨文发现者。再如对甲骨文字在汉字发展史上地位的认识，他指出殷墟甲骨文已经不是汉字起源之初的纯图画象形状态，而是有了一定程度的线条化和符号化。他从甲骨文字形分析“六书”造字法的先后关系与变化过程，先是象形，在象形基础上逐渐产生指事、会意，形声的造字法最为重要，最后才有了转注和假借，甲骨文已经远离原始文字阶段，有了一定程度的成熟性。再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王先生对甲骨卜辞这种新出现的信史材料的学术意义和史料价值，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王先生曾为乃师唐兰的一部甲骨学著作《甲骨文自然分类简编》写了序言，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先生对于甲骨文字形体系的认知。唐先生此书是一部以每个甲骨文字为单位，按照字形系联而编成的甲骨文字典。这比以往的古文字工具书受许慎《说文解字》影响，大都按照偏旁部首的类别归从、起一终亥而编制成的做法，确实有所突破。王先生认为，过去按照小篆字形而分别的部首，并不适合甲骨文字，并举甲骨文中“祖”作“且”并不从示，而甲骨文“妣”字作“匕”也不从“女”，如果按照小篆形体以《说文解字》的编排次序分别排入“示”部和“女”部，就不是合理的“以类相从”了。况且，王先生还指出了《说文解字》的分别部首体系本身还存在着不少不合理之处。所以王先生认为由唐兰创设、日本学者岛邦男继而沿用的这种真正以类相从、按形检索的甲骨文字自然分类体系，是个了不起的独创。

另外，除了殷墟发现商代晚期甲骨文之外，又在陕西周原一带发现了西周甲骨文，这迅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面对发掘者和多数学者认为的周人本地占卜观点，王先生坚持独立思考，撰写了《陕西周原所出甲骨文的来源试探》一文，从商周两个对立的民族关系、族群祭祀对象以及龟甲产地地域等角度入手，认为这些西周甲骨文绝大部分并非周人占卜卜辞，不可能是周人祭祀商人祖先的产物，或是商末卜师投奔周族时携带过去的，对西周甲骨文的族属、来源和性质等作了自己的判断，成为这一甲骨学分支学科的一家之言。

题为王玉哲《甲骨、金文中的“朝”与“明”字及其相关问题》文章书影。

和事草记

杨力



作为调味品，葱的药性往往被人忽略。小时候，有一次我受了风寒，鼻塞头痛，浑身发冷。祖母从厨房取了几段葱白、一小把豆豉，丢进锅里煮了一碗热汤，催我趁热喝下。一碗下肚，额头后背便渗出细汗，身子也松快了许多。后来我才知道，这便是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记载的葱豉汤。葱的药用记载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而葱白“辛温通阳”的药性，自汉魏起，便为历代医家所识。

还有一次是我7岁那年，贪吃西瓜半夜肚子痛，蜷在床上直冒冷汗。祖母从灶台边掐了几根葱白，又去院里掰了几块老姜，一起捣成糊状，用布包了敷在我肚脐上。一股温热缓缓渗进身体，像捂进了一个暖炉，腹痛竟慢慢缓解了。后来读相关典籍，才恍然明白祖母那夜敷在肚脐上的，正是最朴素却最见效的土方子，以辛散寒，以温通滞，不比药汤慢。

少时只觉得葱做菜好吃，长大后去姑父开的菜馆帮工，又悟到一些道理。菜馆的大厨，最擅长葱烧海参。几段葱白在热油中煸炒，焦香四溢，原本霸道辛辣的山野之气，渐渐化为醇厚甘润的底味，托举着海参的鲜美。大厨一边颠勺一边念叨：“这葱啊，有人叫它‘和事草’，不是没道理，生时冲得很，一入热油就温顺了，调和百味，从不抢主菜的风头。”那时我半懂不懂，后来自己做葱油拌面，小火慢熬，眼看着葱白由白转黄，由硬变软，那股凌厉辛辣最终化作温润醇厚的滋味，才慢慢品出其中道理。葱烧海参的奥秘，全在火候分寸之间，葱生时辛辣散寒，熟后甘温和中，这种转变，恰如人的沉淀。年轻时棱角分明，如生葱般辛辣凌厉；经岁月与世事的“烹煮”，才懂得收敛锋芒，做一棵“和事草”，不争为主，却善与同味。

随着见识增长，更觉葱能体现一方水土的性情。有一年去山东，第一次见近一人高的章丘大葱，有的葱白粗壮如孩童手臂，着实吃了一惊。当地朋友拉着我去早市，看商贩把葱立在板车上，像一排排旗杆。他掰了一段葱白递给我，我犹豫着咬了一口，脆甜微辛，汁水迸出来，带着齐鲁大地的敦厚与豪迈。老舍先生曾写济南的葱，“葱白起码有三尺来长……鲜，白，带着滋养生命的乳浆”，拿它卷一张煎饼，蘸一勺豆瓣酱，便是最踏实的满足。后来在南方，见到的香葱又不同，细细柔柔，像江南女子的纤细手指。在苏州，巷口面馆的阿婆煮一碗阳春面，起锅前总要抓一小把葱花，手腕一抖，星星点点飘在清汤上。那香馥地就活了，温和内敛，不抢汤头的鲜，少了葱便失了魂魄。一北一南，一刚一柔，却都甘居配角，与百味调和而不夺其主，这大概是葱走遍天下皆受欢迎的缘由。

《礼记·内则》里说“脍，春用葱”，原来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懂得用葱来唤醒春日味蕾。葱这根青白之物，生于田垄，香于庖厨，载于医典，默默陪着一代代国人的三餐四季。它教会我们的，是通达、调和与成全。

